

# 日本国际发展知识体系的建构

## ——从传统到前沿的历史演变

汪牧耘

**【内容摘要】** 日本国际发展知识常因缺乏独特的体系和理论而被诟病，但这些批判多未考虑日本知识生产的实际历程。本文以日本国内相关研究为基础，分析日本没有独特的、成体系的发展知识的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二战后日本学者对高举国家旗帜持消极态度。其次，受援国在战后反日情绪高涨，强调日本特色不利于援助的实施。最后，今天的日本更重视具有实践性的、具体的知识，但此类知识难以体系化。然而，从前沿的研究来看，日本学者并未停止构建新的理论和认知框架的尝试。本文以日本为例，强调考察别国的知识生产时应关注其内在历程，而非只是推测其在政治或经济上的目的，这样，将更有益于学者对发展、知识和实践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 发展知识 对外援助 知识生产 学术前沿

**【中图分类号】** C912.67 (313)

**【文章编号】** 1003-4048(2021)03-0047-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21.03.005

**【作者简介】** 汪牧耘，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博士生

### 一、引言

随着中国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显著的社会进步，因此可以归纳总结为中国发展经验的需求愈加增大。<sup>[1]</sup>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表示，要对西方发展研究的主流话语做出回应和挑战。<sup>[2]</sup>一些学者提出，要像美国战后的学术创新运动一样，通过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进行学术研究，建立新的知识基础，展示中国对国家和世界秩

序的新观点。<sup>[3]</sup>201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推动本国发展知识<sup>①</sup>的生产。<sup>[4]</sup>

对外援助研究是发展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中国学者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历史不仅是中国汲取经验和教训的素材，同时也为中国认识本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特色提供了参照系。在关于其他国家对外援助的研究中，美国

<sup>①</sup> 发展知识(development knowledge)一词目前并无明确定义。就其用法而言，泛指各种发展经验的理论性、系统性归纳。在具体层面，发展知识是农村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各领域实践的认知基础。在抽象层面，发展知识是关于发展的理念、方针、规律和经验的总结。本文中，提到日本没有发展知识这一批评时，主要取后者之意。

和日本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见图1）。<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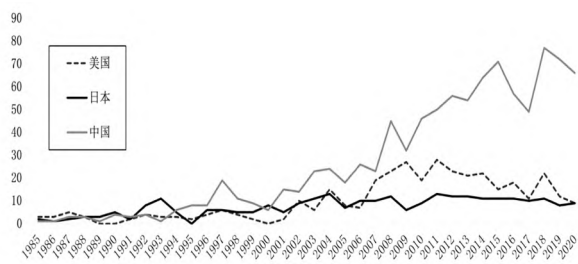


图1 国别援助相关研究的中文文献数量变化 (单位: 篇)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CNKI 检索数据绘制<sup>[5]</sup>

如何通过他国的经验反思发展知识的建构? 本文重点关注曾被称为“东亚奇迹”的日本的经验。选择以日本为对象的原因有两点。首先, 目前国内对日本发展知识的研究并不深入。同为东亚强国, 日本的崛起以及其在崛起中面临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今天的中国相似。这种相似性本应促进中国对日本经验的探讨和理解, 但目前的研究状况并不理想。一些学者批评道, 日本有发展经验而无发展知识,<sup>[6]</sup>但对什么是发展知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其一些文献中, 发展知识时而指代一种方针(如“自助努力”), 时而指代一种政经关系(如“发展型国家”), 时而又指代援助内容上的特征(如“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而衡量日本发展知识建构成功与否的标准, 则局限于援助方针和理念传播的广度, 以及是否对抗国际主流话语。此外, 这些分析的对象多是统计数据和政府政策, 引用来源只限于中英文资料, 而较少涉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本文将说明, 虽然日本学者也承认本国的发展研究缺乏独特的理论性知识, 但这一现象的形成是有原因的。

其次, 以日本为对象有益于摆脱中西二元对立的语境。正如一些学者所说,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学者面临着深层的主体性焦虑, 因此迫切希望有一个“西方”, 并通过把握它、挑战它, 以重返

世界中心。<sup>[7]</sup>中国学者积极建立“中国发展知识”的背后, 也有与西方争夺话语权的需求。在发展援助话语中, “西方”一词被发明的同时也被脸谱化。这种虚构的参照系导致了自身认识的偏差, 而矫正这种偏差的方式之一, 就是通过深入理解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知识, 从而将中国客体化。<sup>[8]</sup>然而如上所述,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 笔者试图解答为何日本没有独特的发展知识体系。本文将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 梳理中国国内关于日本对外援助研究的现状, 并基于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明确本文的视角和研究对象; 第二, 梳理日本国内的研究成果, 并以日本国际发展学会、“大来奖”和具体专著为例, 说明日本发展研究的特征; 第三, 在前项基础上, 回答为何日本型发展知识看似缺席, 并指出构建发展知识所面临的课题。

## 二、中国国内关于日本对外援助研究的现状

### (一) 相关研究的概要分析

本节将对以往研究的综述, 分析中国学界对日本发展援助的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的讨论大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一些专业性研究。长期以来, 关于日本援助的研究主要讨论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直至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中国学者多把 ODA 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予以考察, 并基于国家利益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sup>[9]</sup>王平以 1990~2010 年出版的八本学术专著为例, 对中国学者的日本 ODA 研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学者的研究多是对政策、数据统计及国际关系局势的宏观分析, 而少有访谈和田野调查。<sup>[10]</sup>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对中文学术期刊中以日本援助为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考察,<sup>②</sup>得出

① 笔者在中国知网的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显示, 论文的篇名中包含“美国+援助”的文献数量为 394 篇、“日本+援助”为 287 篇, 远高于“德国+援助”(50 篇)、“英国+援助”(50 篇)、“韩国+援助”(37 篇)、“法国+援助”(29 篇)等。

② 检索条件如下: 利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 搜索篇名中含有“日本”和“援助”, 并被收录在北大核心及 CSSCI 中的学术期刊论文。检索结果共有 130 篇。去除一部分与主题不符合的论文后剩余 115 篇。在此基础上, 添加相关的核心文献进行分析。

类似结论。分析样本中，基于国际政治和经济角度，对日本 ODA 的历史变化和国家战略进行分析的研究，占总论文数的 76% 以上。研究目的多为分析日本援助的优缺点、日本政府的意图和战略，总结其经验教训。

学者一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款定为日本的对外援助的起点。日本援助发展至今，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机上，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日本援助是出于对本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保障的需要，其重点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sup>[11]</sup> 例如，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振兴本国产业和获取资源。而在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外交中心转移到亚洲，对外援助作为政治和外交手段的特征有所加强。<sup>[12]</sup> 在数量上，广场协定的签署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对外援助额达到了惊人的数量，但进入 21 世纪后其额度随日本本国经济的低迷有所下降。在质量上，战后初期日本援助被欧美国家批判为“低质量的利己主义”，而今天，“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成了日本援助的卖点。<sup>[13]</sup> 在发展知识创新方面，日本援助形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国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模式，并在其援助额的上升期积极推广“发展型国家”理念，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度。特别是以经济援助、投资和进口贸易相结合的援助模式，对中国的援助方针也有一定影响。<sup>[14]</sup> 但由于日本学术界没有独创性的研究和总结能力，故而“在与西方援助国的竞争中，日本没能守住自己在援助领域最鲜明的特点，反而越来越附和西方援助国的话语，从自助努力、重视基础设施慢慢转变为同时考虑安全、环境、减贫等多项事宜的杂项清单”。<sup>[15]</sup>

## （二）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评价的特征与局限

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的评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面对不断变化的日本对外援助，学者的评价和出发点受各时期的中日关系影响有所不同。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日本援助背后的政治目的持批判态度。不过，中日关系在 2018 年有所改善，一些研究开始把论述的重点转移到如何与日本相互合

作，而不是相互竞争。<sup>[16]</sup>

第二，学者关于同一主题的评价不同，不同评价之间缺少对话。例如，就运行体制而言，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缺乏援助体制建设，表示日本对外援助的系统化管理和评价体系较为成熟，有借鉴意义。<sup>[17]</sup> 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对外援助在行政管理制度上极为复杂，特别是“四省厅协议制”往往被认为是日本援助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sup>[18]</sup> 就援助的效果而言，日本政府善于通过青年海外协力队（Japan Overseas Cooperation Volunteers, JOCV）、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等政治色彩较弱的援助实施主体，深入受援国的具体地区，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博得受援国对日本的好感，这为中国援助在海外获得当地民心提供了参考。<sup>[19]</sup> 还有一些学者对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在受援国的当地事务所职员进行采访，认为日本援助符合受援国的实际国情，且重视当地的实际需求，值得中国借鉴。<sup>[20]</sup>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表示，日本的援助和欧美的援助相比，不仅过于偏重基础设施，还有附加条件过多、技术转移效率低下等缺点。<sup>[21]</sup> 就发展知识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研究所遵循国际规范、重视学术质量，是亚洲发展援助智库的成功典范。<sup>[22]</sup> 今天，在相比中国学者创造本国发展知识的迫切需要的情况下，日本则被视为不积极输出发展知识的反面教材。

第三，中国学者较多关注日本援助转型的结果而非过程。如上所述，中国学者从多种角度分析了日本的援助，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成果。但很多论文基于中国当下需求对日本援助大事记和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关注和解释。分析关注政治目的和经济效果，并旨在从中吸取对中国有用的教训。从中国的问题意识出发理解日本的历史经验无可厚非，但现行研究框架下所得出的结论，已呈现出了一定的矛盾和局限性。<sup>①</sup> 为了加深对其他国家对外援助的理解，应该从他国所面临的具体历史场景出发，来说明其行为的内在逻辑，而非以研究目的决定评价的标准。

<sup>①</sup> 处理这些矛盾点是深化理解的重要契机。例如，为什么日本的援助附加条件多，却仍获得受援国政府的青睐呢？为什么日本在没有专门设立“援助厅”的情况下，援助体系也似乎在有效地运作？为什么青年海外志愿者明明是日本的“外交工具”，但其活动并没有使受援国感到令人不快的政治意图？这类讨论有待深入。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日本在发展援助领域有丰富的经验，是中国建构本国发展知识过程中重要的参考对象。而目前，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学术界构建发展知识的能力不足，没有清晰阐明自身发展理念的优势。但是，这种见解没有超越中国对日本援助研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即仅从中国当下需要出发，而忽略了日本本国的讨论。基于这种研究现状，笔者尝试基于日本国内的视角，分析日本发展知识的生产特点，并对日本型发展知识看似缺席的原因进行分析。下文将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论述：第一，日本学者关于日本型援助发展援助都进行过哪些讨论；第二，日本国内发展研究学界有怎样的特征；第三，日本学者如何尝试理论创新。

## 三、日本发展知识的形成及其特征

### （一）关于日本型发展援助的讨论

#### 1. 日本对外援助方针的形成

1954年，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是其从受援国向援助国转型的起点。至1976年，日本的援助主要受冷战及本国经济增长需要影响，并无固定的对外援助体制。1977年，日本的对外援助进入计划性的扩充时期。由于日本的贸易顺差产生了经济摩擦，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开始要求日本担负起贸易顺差国应尽的责任，日本政府继而发表了“ODA五年倍增计划”。1985年后，广场协定的签订导致日元大幅增值，迫使日本企业将生产线向海外转移，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显著增多。在此影响下，日本于198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净额）。<sup>[23]</sup>

另一方面，与今天对中国的批评如出一辙，当时的西方援助者亦视快速崛起的日本为异己，批评日本只顾自身利益、援助的附加条件多、偏重基础设施建设等。<sup>[24]</sup>而在受援国当地，日本被批判为新殖民主义者和实施经济控制，导致了很冲突和对立。例如，在巴西，日本对外援助的从业人员被当地的少年射杀。<sup>[25]</sup>而在菲律宾，日本的青年海外志愿者队员遭当地民众投石。<sup>[26]</sup>特

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泰国等许多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和劳动者等社会各界都参与其中。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对ODA的批判也在20世纪80~90年代到达顶峰。1986年3月，时任菲律宾总统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受贿事件（Marcos-ODA bribery case）被大众媒体曝光，在日本市民阶层中激起了对ODA正当性的广泛质疑和讨论。<sup>[27]</sup>日本的NGO等市民团体基于对大型援助项目的调查，从人权、环境问题、人的基本需要等方面对本国对外援助展开了多维度批评，<sup>[28]</sup>促进了日本ODA的反思和转型。<sup>[29]</sup>

1987年，日本通产省提出了“新亚洲工业化综合协力计划”（New Asi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推进了经济援助、投资和进口贸易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援助形态，它也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型发展援助模式。<sup>[30]</sup>“三位一体”的援助模式基于贸易和援助相结合的理念，是日本与欧美的不同之处。这一模式也为中国发展援助所借鉴。<sup>[31]</sup>下村认为，该模式的形成源于受援国对日本的要求，以及日本对这些要求的回应。换句话说，是发展中国家在急速增长中主体性的结果，由此促进了日本型发展援助模式的形成。与此同时，日本援助开始更多关注受援国全体社会的需求，这也是后来被学者称为日本“顾客导向型”对外援助模式的形成背景。<sup>[32]</sup>如前所述，一些中国学者指出日本在其援助扩充时期积极主动地推广其援助理念。但综上可知，至少直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援助理念的成立与其说是主动宣传，不如说是在面对各种反对和质疑中产生的。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成了日本政府推进ODA规范化的主要动因。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增长，国际援助的问题类型呈现多样化特征。1992年，日本政府首次颁布《ODA大纲》，提出四项原则，明确规定日本的ODA不可用于军事合作。2003年，日本修订《ODA大纲》，将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sup>①</sup>概念作为援助的重点，并鼓励日本政府之外的主体

① 所谓“人类安全”，具体包括从“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两个方面。

如民间企业、NGO、NPO等积极参与援助事业。201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发展合作大纲》取代《ODA大纲》,新大纲摆脱了以往的“援助国/受援国”的二元结构,将援助理念扩大到世界范围的相互合作。日本政府表示,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和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确保国家利益”这样的说法首次在大纲中出现,引起了日本学界的争论。<sup>[33]</sup>ODA大纲的制定和修订,反映了日本在变化的国际社会环境中重新定义自身经验和特征的摸索过程。

## 2. 对日本援助特色的进一步讨论

“日本没有自己的援助哲学”,这样的批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在日本国内出现。<sup>[34]</sup>日本学者也指出,虽然日本援助在技术转移等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积累,但却缺少关于发展的本质讨论。作为对“援助哲学”的回应,“自助努力”<sup>①</sup>这一词开始被频繁提起。然而,考虑到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主张(如中国),日本学者认为一味强调“自助努力”为本国特有的理念,并无实际意义。<sup>[35]</sup>

为什么日本没有积极地建构和宣扬自己的发展知识体系?其原因有三点。第一,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外援助频繁遭遇受援国的抵抗和不信任。如上所述,在战后浓厚的反日氛围下,亚洲各受援国并不存在对日本发展模式的憧憬,因此日本也就缺少归纳总结自身经验并使之广泛传播的动力。第二,参与日本国际援助早期建设的人物大多都有惨痛的战争记忆,因此对于日本的自我彰显比较警惕和克制。因此,对于战后的日本援助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展示日本的实力和理念,而是通过一种更温和的方式,让亚洲国家重新接纳日本。<sup>[36]</sup>在日本经济发展和对外援助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大来佐武郎<sup>②</sup>也表示,在战后,日本国内知识分子对战争的反省和亚洲各国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负面记忆,使得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对

宣扬国家民族特性保持警觉。<sup>[37]</sup>换言之,战后的日本不积极宣传和普及日本型发展知识的背后,是对战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战后亚洲局势的判断。

除上述被动原因之外,也有其他因素,如日本对受援国自身特殊性的重视。这不仅体现在以国家为主体的顾客导向模式,更体现在对援助现场实际状况的重视。一些日本学者认为,重视现场的倾向,可追溯到日本援助体制初创期的那一代日本人参与资源调查活动的经历。因为资源调查,即要求基于当地特有的资源分布情况和种类,来制定其日后的分配体制和发展计划。<sup>[38]</sup>而要了解这一倾向的深化,则需介绍日本国内工业化的历史和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国内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导致以环境污染为代表的各类问题持续爆发,对日本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现代化的阴影促使日本学者反思西方发展经验,并对西方以外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 and 理论建构。其成果之一就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鹤见和子为主而提出的“内发型发展论”。“内发型发展论”强调,比起在近代社会中形成的各种工具型理性及其衍生的体制,基于人们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学者应该通过比较作为生活世界单位的“地方”,发现规模地方社会传统中,普通民众在面临困难时具有智慧和创造性。<sup>[39]</sup>

今天的日本发展研究也不难看出其与上述视角的关系性。例如有学者提出,日本发展援助的重要经验在于明确发展援助的终端并非国家,而是个人。因此,援助的中心并非以国家为前提的系统性知识,而是以地方为主体的实践型知识(phronesis)。<sup>[40]</sup>从事教育学研究的泽村信英也指出,日本的援助很少谈“日本知识”,而多说“日本经验”,因为援助并不是通过成体系的知识或理论发挥作用的。所谓发展

① 1989年,日本外务省开始将日本援助政策的哲学叙述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助努力”。1992年,“自助努力”作为日本援助的基本理念出现在《ODA大纲》中。

② 大来佐武郎(1914~1993),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政府的递信省、外务省、综合开发局等部门担任要职。大来氏不仅是实现日本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功臣,也是推动日本国际发展研究的重要人物,还参与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曾任当时谷牧副总理的顾问。

援助，最重要的是基于对受援国具体社会的理解而开展的实践活动，而非输出固定的发展模式。<sup>[41]</sup>

### (二) 日本发展研究学界动态

上述关于国际发展援助的经验总结，与日本发展知识的生产机制之间呈现何种关系呢？本小节以日本的学会、学术奖项与最新的研究动向为例，进一步分析日本国内发展知识的行为主体及其知识生产的特征。

#### 1. 发展知识的生产者与评价标准

学术团体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日本国际发展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ASID)成立于1990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发展相关学会。JASID成立之初，旨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进步、提高政府能力、发展民族文化和环境保护等需要的同时，加深日本国民对发展问题的理解。通过JASID，日本学界

意在构建横跨各学术领域的交流平台，聚焦不同领域中所遭遇的发展问题及相关经验，以进行更好的政策研究，培养国际发展领域的人才。<sup>[42]</sup>1991年，JASID主编学术期刊《国际发展研究》正式发行。在发刊词中，时任国际大学名誉校长的大来佐武郎特别寄语，期待日本同时作为工业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其发展研究能够在东西冷战结束之后，成为连接“南北”两边的桥梁。<sup>[43]</sup>

JASID的会员在创立初期约670名，在2005年以后大致维持在1600~1800人，会员所属的机构和团体类型较为多样。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职员、国内外各大学的师生、咨询公司社员、NGO职员、建筑、医疗等相关专业人员等。图2显示了JASID会员的专业、研究课题以及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所在地区等情况，三项均为JASID新会员入会登记时的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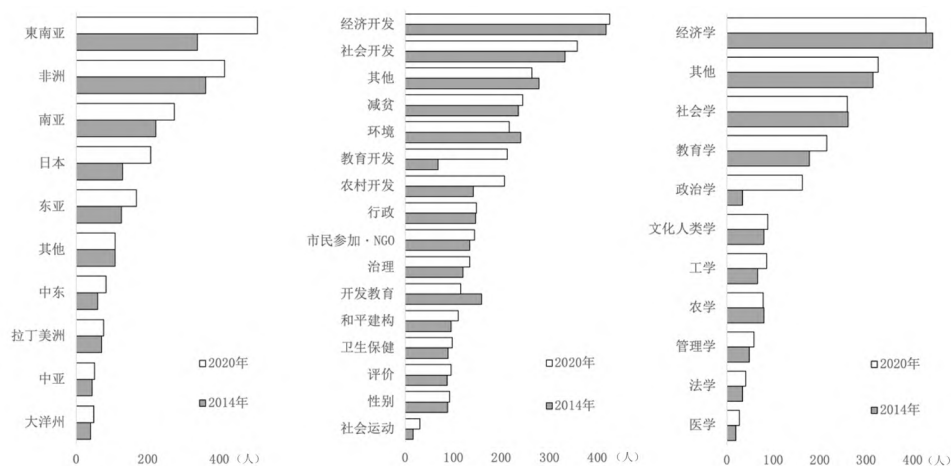


图2 JASID会员的研究领域及人数【按地区(左), 题目(中), 学科(右)分类】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JASID学会会员名录制作

通过图2的数据可以总结出JASID作为学术团体在研究方面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会员的专业背景遍布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国际发展学界，JASID中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占比最高，但有教育学和社会学背景的会员人数也极其可观。除人文社会科学之外，着力于发展援助中技术性实践的自然科学及工学背景的会员也占一定比例。与此同时，自认为不从属于既有的传统学术领

域(“其他”选项)的会员人数较多，体现了发展研究的学科多样性。对应上节所述的日本发展历程，JASID会员在专业和课题上的分布体现了学者对教育、环境、地域社会等发展问题的重视。

第二，会员的调查地区和课题类型比较多样。调查区域主要是以东南亚和非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之下，日本国内的发展问题在发展研究中所占比重不大。这一点与中国发展

知识生产的特征形成对比。在日本，发展研究主要是指对外援助的研究，而在中国，国内发展问题和对外援助研究都包括在内。正如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CIKD）所说，中国发展知识的重点是通过分享经验，发现中国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保持中国自身的发展。<sup>[44]</sup>另外，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学者数量较多。2020年举办的JASID日本全国大会，专门安排了针对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国际发展学2.0”圆桌讨论，其主要的问题意识就是讨论发展研究者无

法奔赴田野这一困境可能带来的发展知识的结构性变化。<sup>[45]</sup>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日本发展研究扎根田野的特点。<sup>[46]</sup>

然而，日本的发展研究并非从一开始就见长于实地调查，这一点从“大来奖”的获奖情况即可看出。1997年，日本国际发展学界设立了“国际发展研究大来奖”，以鼓励每年在国际发展领域卓有贡献的研究成果。<sup>[47]</sup>“大来”即是大来佐武郎的姓氏，“大来奖”可以说是日本发展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表1 大来奖历年获奖作品的研究对象

年份	地域	学术领域或主题	年份	地域	学术领域或主题
1997	非洲西部	农业发展, 水资源, 生态环境, 农业	2007	肯尼亚	人类学, 农村经济
	-	发展经济学	2008	孟加拉国	地域研究, 农村, 土地问题
1998	-	发展经济学	2009	卢旺达	地域研究, 战争, 建设和平
	韩国	发展经济学	2010	印度	人类学, 阶层, 平等
1999	中国	发展经济学	2011	(无获奖作品)	
	非洲南部	农村经济, 结构性调整	2012	印度尼西亚	
2000	非洲	发展经济学, 市场经济	2013	菲律宾	社会福利, 残疾人
2001	-	发展经济学		伊拉克	地域研究, 国家建设
	-	发展经济学, 贫困问题	2014	印度	发展经济学
2002	菲律宾	地域研究, 援助政策, 女性, 纷争	2015	坦桑尼亚	发展经济学, 贫困
	印度	经济学, 社会福利, 殖民	2016	亚洲	日本援助, 外交
2003	非洲	地域研究, 经济, 贫困		坦桑尼亚	地域研究, 性别, 土地制度
2004	-	经济理论研究	2017	多地域	发展研究, 方法论, 贫困, 资源, 援助
	墨西哥	宏观经济, 金融, 贫困	2018	中国/缅甸	人类学, 民族
2005	孟加拉国	地域研究, 农村, 经济理论	2019	加纳	人类学, 开发政策
2006	孟加拉国	人类学, 环境, 贫困	2020	菲律宾	地域研究, 建设和平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FASID的获奖作品名单制作<sup>[48]</sup>

通过分析从1997年至今获奖作品的内容可以发现，考察日本国际发展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知识生产的重点有所转移。早期的获奖作品多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为中心（见表1）。但随着日本援助领域的扩大和方针变化，发展研究的话题更加多样。从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来奖”评委提出，作品的选拔标准将更加注重知识的实践意义而非理论。在此后的获奖作品中，深度描绘受援国的具体发展实践经验的民族志和地域研究增多。

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与初期的发展经济学理

论有着不同的知识特征。基于地域研究的发展知识更注重具体社会的微观场景，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本文前面的论述已表明，日本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发展知识体系，这一事实特征和本节中学术贡献评价指标的转换相互印证。简言之，日本学界认为体系化的知识并不能保证好的发展实践，微观、具体的剖析才能增进援助者对地方的理解，从而进行因地制宜的实践工作。

实际上，将发展援助的知识生产重点转向关注具体实践之潮流不只发生在日本，在整个发展研究领域也逐渐兴起，<sup>[49]</sup>对发展经验理论化的质

疑也由来已久。例如,人类学家列维斯从2000年以后便持续关注文学、音乐和影视作品中的发展叙事。通过剖析文学作品在呈现发展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多样性和深度,他指出,在学术论文框架筛选之下抽离出来的发展知识,通常忽略了现实中决定发展走向的真正细节。<sup>[50]</sup>这也反过来说明,理论化、体系化可能加大发展知识与发展实践的距离。

## 2. 日本发展研究的前沿——以《发展合作的创成:自立与依附的生态史》<sup>①</sup>为例

本节主要参考佐藤仁教授的新书《发展合作的创成:自立与依附的生态史》,分析当今日本发展研究的前沿思考。虽然仅以一位学者的著作难以说明日本学界的全体倾向,但佐藤教授作为现任JASID会长、JICA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和第21届“大来奖”获奖者,是日本发展研究界的中坚力量,<sup>[51]</sup>其观点对理解当前的日本发展研究的动向具有参考意义。

该书基于对现阶段发展合作研究典型问题意识的质疑而展开讨论。当前的发展研究多聚焦于“发展合作如何有效”的问题,其框架的核心是评价项目的目标与结果的出入。例如,通过发展合作是否减轻了贫困、提高农业生产率等。这样的问题意识将研究结果导向了获取实践经验和教训,也把研究目的绑定在解决某问题的手段上,而忽略为什么一个现象变成了“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的“产生/解决”的循环往复中所造成的其他影响。该书试图颠覆上述问题意识,并将讨论的焦点从“发展合作如何有效”转移至“发展合作由何生成,又带来了什么”。

全书以时间为轴,以日本政府官方援助的象征性特征转变为节点,将其历史断代为三个时期:①经济合作的开端(1954~1965年前后)、②从经济合作到发展援助(1966~1989年前后)、③从发展援助到发展合作(1990年代至今),并分别从

“日本政府”“受援国政府”“援助现场”的角度对每个时期发展合作形成与发展的具体情景进行结构性叙述。

笔者认为,全书一以贯之的视角可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把发展合作项目视作超越特定行为主体的目标和计划的“生物”,并把促使这些项目形成、实施且产生特定结果的复合性因素视为各种社会文化背景相互博弈与交融的“生态系统”。基于此视角,该书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分析国内外的各方压力如何影响了日本的援助体制和方针(第1、4、6章)。另一方面,跳出援助者的结果主义评价框架,关注那些超出原计划之外的影响如何在当地社会存留、变形与延续(第5、9章)。第二,重新审视发展研究中不言自明的价值坐标:赞许“自立”(self-reliance),批判“依附”(dependency)。该书通过剖析当地政府的受援体制(第2章)、国内外援助相关人才状况(第3章)、援助主体的多样化(第8章)等各种关系变化如何塑造了发展合作的形式,试图证明,虽然帮助受援国自立一直被视为日本援助的目标,但实际上如果依附关系复杂,日本的援助项目从一开始就难以开展。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追问,自立的主体为何摇摆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如何通过重新梳理日本发展援助的历史,探索另一种实现自立的可能途径(第7章)?

书中第9章可视为全书论点的汇集和方法论上的创新。第9章论述了在30年前被日本民众以及NGO极力批判过的ODA项目的现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国内研究者、NGO和市民社会掀起了批判ODA的浪潮。<sup>②</sup>然而,当初引起日本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项目”在之后却几乎没有相应的反馈和记录。对此,佐藤基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批评ODA的著作(约150本),筛选出16个援助项目,并对其现状进行了田野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30年后的今天,

① 该书是JICA研究所的项目成果、“再论日本发展合作史”系列的第七卷单行本。日文为《開発協力のつくり方—自立と依存の生態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21)。作者佐藤仁教授任教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本节中,笔者征得佐藤教授意见基础上,对此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引用,以尽可能地国内读者呈现日本发展研究的一些角度与方法。

② 例如,鹭见一夫的著作《ODA援助的现实》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十年内再版了20次以上。此书批评道,日本虽成为世界第一的ODA援助大国,其项目却没有真正惠及当地百姓。



大多数的“问题项目”都不再是问题，一些曾经的批评家也转变了态度。

如果只基于项目设计的目标和结果框架来看，曾经被批判的项目可简单归纳为“失败”。但是项目如同生物，其形成、实施和后续影响都基于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回顾发展援助的历史可以看出，精心设计的项目往往在当地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可以说，发展援助从不完全按照计划进行，而是在适应各种阻力和压力之中不断变形。捕捉这些变化、洞察推动这些变化的复杂因素，是评价发展合作项目的重要视角。诚然，这个过程要求研究者有长时段、多维度的观察，并非易事。但若没有对项目长期运行轨迹的认知，提出好的项目设计将更为困难。该书主张，效率、效果等短期评价指标并不能显示发展援助项目的本质。好的援助实践，不是制作完美计划、减少计划外的影响甚至使之消失，而应更积极地评价“自立”“减贫”等援助理念进入受援国，并与当地社会相互碰撞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创造性联结。

在笔者看来，该书对核心概念的解释还有待商榷。例如，“依附”是达成“自立”这一目的的手段，或“依附”本身就是值得赞许的状态？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对于“问题项目”的分析虽角度新颖，却不免有避重就轻之感。但该书明确指出了“个人”才是承受发展合作项目影响的终端以及评估发展合作价值的关键，提供了短期效果评价之外的新视角。对发展合作的价值评估由此获得了不同定义，即在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创建良好的依附关系，强化各国自立状态的同时，避免因无谓的竞争所带来的损失。在此意义上，“自立”与“依附”这一对概念具有了理论上的创新意义。

#### 四、结束语：发展知识体系化的困境

国内学者多以政治、经济等外部视角分析日本的国际发展援助，而本文选择了对日本国内的知识生产状况进行考察。梳理日本国内研究及其特征，不难发现，日本在将发展知识理论化、体系化时面临的困境，既有其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也有问题意识上的普遍性。

通过分析日本学者对本国发展研究的讨论以及相关学术行为主体的活动，笔者认为日本缺乏成体系的发展知识或理论有以下原因：基于战争的惨痛记忆与反思，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高举日本旗帜的做法保持警惕。为了让战后反日情绪高涨的受援国民众接受日本的发展援助，淡化以国家为主体的宣传方式是合理的选择。此外，发展知识的体系化和理念化，未必关乎发展实践的有效性。日本发展研究的学术团体成员专业背景和研究主题多样，各时期对发展研究价值的评价略有差异。2000年以后，扎根田野与有关具体发展实践的研究更受重视。由此产生的知识依赖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难以被抽象为某种发展理念或规律，这也加大了日本发展知识体系建构的难度。但这并不是说日本学者对发展知识的理论建构毫无关心。以日本前沿的研究为例，一些学者尝试通过重新解读本国的援助史，构建新的发展援助效果分析框架，以摆脱结果论导向的评价方式所导致的弊端。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对日本的发展知识进行全方位说明，但提供了一种从日本内部考察其知识生产的角度。面对当前中国学者以政策分析和政经理论为主导的发展研究倾向，加深对其他国家知识生产历程的理解更有必要。虽然中日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作为对“知识与实践的关系”这一更大命题的讨论，日本学者的思考和尝试，无疑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最后，笔者认为以下四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值得思考和研究。第一，发展知识是谁的知识？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是谁？第二，不同学者评价“发展知识”价值时的知识论框架是什么？第三，什么决定了发展知识与发展实践的关系？第四，如何有效传递实践型知识？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

#### 参考文献：

- [1] Han Cheng and Weidong Liu. Disciplinary Ge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hina[J]. Political Geography, 2021(89):102452:3-4.
- [2] 李小云, 徐秀丽, 齐顾波. 反思发展研究: 历史渊源、理论流派与国际前沿[J]. 经济评论, 2015(1):157-159.

- [3] 徐秀丽, 李小云. 发展知识: 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 [J]. 文化纵横, 2020(1):101.
- [4]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OL].(2021-6-1).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官网, <http://www.cikd.org/chinese/aboutus>.
- [5] 关键词搜索结果 [DB].(2021-1-21) 中国知网官网, <https://www.cnki.net>.
- [6][15] 徐加, 徐秀丽. 被架空的援助领导者: 日本战后国际援助的兴与衰 [J]. 文化纵横, 2020(6):122、121.
- [7] 梁永佳. 超越社会科学的“中西二分” [J]. 开放时代, 2019(6):71.
- [8] 陳光興. 「亞洲」作為方法 [J].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05(57):139~218.
- [9] 岡田実. 中国における ODA 研究から見る ODA 観と日中関係 [J]. 国際協力研究, 2003 (2) :28.
- [10] 王平. 中国人研究者による日本の ODA の研究 [A]. 中国の対外援助 [C]. 東京: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12:90.
- [11] 张光. 冷战后的日本对外援助政策走向 [J]. 日本学刊, 1993(4):35~54.
- [12] 彭云. 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 [J].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 2009(26):2:104.
- [13] 马学礼, 刘娟. 日本基础设施海外输出战略及其与“一带一路”对接研究 [J]. 日本问题研究, 2019(2):72.
- [14] 王平. 中国の「三位一体」型援助と日本の経験 [A]. 下村恭民, 大橋英夫.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中国の対外援助 [M]. 東京: 日本経済評論社, 2013: 157.
- [16] 孟晓旭. 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及与中国的竞争合作 [J]. 现代日本经济, 2018(37)6:77.
- [17] 黄梅波, 蒙婷凤. 新世纪日本的对外援助及其管理 [J]. 国际经济合作, 2011(2):39.
- [18] 王平. 日本 ODA 决策体系中主导权变化研究 [J]. 日本研究, 2010(1):31.
- [19] 胡澎. 日本 NGO 的发展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 [J]. 日本学刊, 2011(4):128.
- [20] 陆继霞, 王伊欢. 日本对非洲农业援助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以坦桑尼亚为例 [J]. 世界农业, 2015(7):14、17.
- [21] 张博文.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 分析与评价 [J]. 国际经济合作, 2014(4):38.
- [22] 贺平, 叶思雨. 发展援助型智库的自主性困境: 以日本 JICA 研究所为例 [J]. 复旦政治评论, 2018(2):173~174.
- [23] 和喜多裕一. 開発協力大綱の意義と課題: ODA60 年の歴史から探る新たな開発協力の姿 [J]. 立法と調査立法と調査, 2015(361):84.
- [24][30][32][35] 下村恭民. 日本型開発協力の形成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20:175、137、198~200、181~184.
- [25] 荒木光弥. 途上国援助・歴史の証言・1970 年代 [M]. 東京: 国際開発ジャーナル社, 1997: 82.
- [26] 北岡伸一. 夏季職員トップセミナー: 今後の日本の国際協力 [J]. 財務省広報誌, 2020,56(8):67.
- [27] 荒木光弥. 途上国援助 歴史の証言 1980 年代 [M]. 東京: 国際開発ジャーナル社, 1997: 51.
- [28] 鷺見一夫. ODA 援助の現実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89:8~9.
- [29] 佐藤仁. 開発協力のつくられ方—自立と依存の生態史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21:184.
- [31] 周宝根. 从对外经贸视角看如何提高我国援外项目的有效性 [J]. 红旗文稿, 2010(19):18~19.
- [33] 大山貴稔.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 ODA 言説の転換過程——利己主義的な見地は如何にして前景化してきたか [C]. 「日本の開発協力の歴史」バックグラウンドペーパー, 2019(8):2~3.
- [34] 渡辺利夫. 国際協力と人間: 「アジア」専門家の学問ばなし [M]. 東京: 三五館, 1998:215.
- [36] 渡辺武. アジア開銀総裁日記 [M].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社, 1973: 1~2.
- [37] 大来佐武郎. 私の履歴書——日本人として国際人として [M]. 東京: 日本経済新聞社, 1977:103~105.
- [38] 佐藤仁. 野蛮から生存の開発論: 越境する援助のデザイン [M]. 東京: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6:279~280.
- [39] 鶴見和子, 川田侃 (編著) 内発的發展論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9:44~53.
- [40] 西川潤, 下村恭民, 高橋基樹等. 開発を問い直す: 転換する世界と日本の国際協力 [M]. 東京: 日本評論社, 2011:190~191.
- [41] Nobuhide Sawamura. "Local Spirit, Global Knowledge: a Japanese Approach to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2(32)3:339.
- [42] 国際開発学会. 設立趣意 [OL].(2021-6-1). 国際開発学会, [https://www.jasid.org/overview/overview\\_prospect](https://www.jasid.org/overview/overview_prospect).
- [43] 大来佐武郎. 特別寄稿 [J]. 国際開発研究, 1991: i ~ iv .
- [44] 中国国际知识发展中心. 关于分享中国发展知识的思考 [OL].(2021-6-1). <http://www.cikd.org/chinese/TalksDetail?docid=1647>.

[45] 山田肖子, 大場麻代, 汪牧耘等. 国際開発学 2.0-新型コロナと国際開発学のニューノーマル [J]. 国際開発研究, 2021(30)1:75.

[46] Jin Sato. "Research at a Distance: Area Studies in the Post-Pandemic Er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20(17):105~104.

[47] 国際開発研究 大来賞 [OL]. (2021-6-1) JASID, [https://www.fasid.or.jp/okita\\_memorial\\_prize/](https://www.fasid.or.jp/okita_memorial_prize/).

[48] これまでの受賞作品 (詳細)[OL]. (2021-6-1). JASID, [https://www.fasid.or.jp/okita\\_memorial\\_prize/5\\_index\\_detail.php#award-19](https://www.fasid.or.jp/okita_memorial_prize/5_index_detail.php#award-19).

[49] Shin-KapHan, Sang-Jic Lee and Yun-JooSung.

Shifting Focu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Papers in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1998~2013[J].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2014(43)1:59~60.

[50] David Lewis, Dennis Rodgers and Michael Woolcock. "The Fiction of Development: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s a Source of Authoritative Knowledge"[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8(44)2:198~216.

[51] 佐藤仁研究室ホームページ [OL]. (2021-6-1) <http://satoj.ioc.u-tokyo.ac.jp/fileadmin/res/cv.pdf>.

(责任编辑 李 征)

##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Syste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 to Frontier

Wang Muyun

**Abstract:** Japa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nowledg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lack of unique systems and theory. However, most of these criticisms did not consider the actual course of Japanese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Japan's domestic research as the study object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bout the reasons why Japan does not have a unique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development. First, because of the reflections on World War II, Japanese intellectuals have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self-promotion. Second, the anti-Japanese sentiment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rose after the war, so emphasizing Japa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id. Finally, practical and specific knowledge is more valued in Japan today, but such knowledge is difficult to be systematized.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ontier research, Japanese scholars have not stopped trying to construct new theories and cognitive frameworks. Taking Japa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when investigat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other countrie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ts internal process, rather than just speculate on its political or economic purpose, which is more constructive for scholars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knowledge, and practice.

**Key Words:** Development Knowledge; Foreign Aid; Knowledge Production; Academic Frontier